

严复思想 与中国现代化

黄瑞霖 © 主编



海峡文艺出版社

严复思想 与中国现代化

黄瑞霖 ◎ 主编



海峡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严复思想与中国现代化/黄瑞霖主编. —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8.11
ISBN 978-7-80719-331-9

I. 严… II. 黄… III. 严复(1853~1921)
—思想评论—文集 IV. B256.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63528 号

严复思想与中国现代化

主编:黄瑞霖

责任编辑:何 强

编辑助理:庄琳芳

出版发行:海峡文艺出版社

社址: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14 层

邮编:350001

发行部电话:0591—87536724

印刷:福州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邮编:350003

开本:787×1092 毫米 1/16

字数:450 千字

印张:25.25

版次: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0719-331-9

定价:5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编辑委员会

主任:黄瑞霖

副主任:杨华基

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聪深	卢美松	许在全	杨泗德
李正午	苏振芳	严以振	严城官
林腾蛟	罗耀九	陈端坤	高翔
黄苑			

组织:福建省严复学术研究会

主编:黄瑞霖

副主编:卢美松 陈锦谷

编辑:(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民	许维勤	苏振芳	陈允树
林怡	翁训彩		

前 言

杨华基

在大约一个半世纪以前，因闭关自守、蒙昧无知而导致落后挨打，“被排斥于世界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马克思语）的中国，开始派出自己的优秀学子，到欧美探究西方富强的奥妙，感知世界文明的潮流，寻找拯痾起弱的良方。那些优秀学子中的许多人，后来成为中国最早具有世界眼光、把握时代脉搏的先知先觉，为中国现代化的起步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严复是他们之中最杰出的代表。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一直为民族复兴苦苦追求，到今天，国家兴盛的局势已是举世公认；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将势不可挡地成为 21 世纪人类历史最壮观的图景。在这样的历史关节点上，我们不但要更加缅怀近代以来仁人志士先知先觉的开拓之功，而且要以更加清醒的头脑，回观他们在诊治中国病根过程中的所思所想，从他们的殚思极虑中，吸取思想精华，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中国的现代化之路，是从学习西方开始的；而中国人真正深入、全面地了解西方，是从严复开始的。在严复之前，中国人囿于“中体西用”的观念，试图在不改变封建政治和文化制度的前提下，通过学习西方军事和工业技术来达到富强。但是，这一梦想却被甲午战争的炮火炸得粉碎。在举国悲怆的气氛中，严复喊出了“不变法则必亡”的时代最强音。他以学贯中西的深厚学养，系统地介绍西方政治和文化，指出西方富强之本不在器物而在于制度和制度文化。学习西方，仅学其技术而不学其政治制度和学术文化，是舍本逐末，只能得到“淮橘为枳”的结果。这些崭新的视野和观念，给国人的思想带来振聋发聩的影响。一部《天演论》，更是彻底地颠覆了国人的历史观和社会观。在此之前，中国人信奉的是治乱、兴衰、合分的历史循环论，《天演论》出来后，社会不断发展进步，“既盛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的观念深入人心；“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规律的揭示，唤起了国人救亡图存的激情。后来无论是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先驱，无不深受严复思想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没有严复的思想启

蒙，就没有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也不会有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在中国现代化的漫漫路程中，严复是一座醒目的里程碑。

严复思想是很深刻的，他敏锐地看到，中国之贫弱、财力的匮乏和军事的落后只是表面现象，其深层原因在于政治、文化的不合时宜；而政治文化不合时宜的根源，又在于“不知平等自由之公理”。长期被封建专制制度“虐待”的人民，都是没有人生保障的“苦力”；驱“苦力”与西方享有民主权利的“爱国者”对抗，没有不失败的道理。所以中国要强盛，就得找到一个“道”，能够使国人“各私中国”，也就是使人人都成为国家的主人，把国家兴旺当做自己的事。这就要求在制度设计上，使每个公民的自由权利得到保障，因此他指出，“今日之治，莫贵乎崇尚自由，自由则各行其所自致，而天择之用存其最宜，太平之盛，可不期而自至”。能够保障个人自由的制度，莫善于民主政体，由此，严复提出“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的深刻命题。建立使人民享有民主权利的政治制度，是严复理想的终极目标。

严复又是个很现实的改革思想家，针对当时国家已经失去独立的状况，他认为不宜急于提倡个人自由，当时中国“所急者，乃国群自由，非小己自由”，中国人应该团结起来，先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才可能求得个人的自由民主权利，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历来缺乏自由民主的传统，在封建专制制度的长期压迫下，民德、民智、民力都极其卑弱，所以中国社会在向现代化的变革当中，不可“期之以骤”，而应以渐次推进的方式，先从教育入手，“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培养现代国民的素质，才可以逐步实现国家政治的现代化和民族的振兴。这种思想，在今天看来，是非常切合中国国情的，也是符合中国近代以来历史发展的实际逻辑的。

严复对国家命运和民族文化的前途充满信心，临终前还交代家人“须知中国不灭”。他一生提倡西学，被公认为中国“西学第一”，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没有持极端否定的态度，而是主张“阔视远想，统新旧而视其通，苞中外而计其全，而后得之”，强调中西文化的融合创新。他相信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耐久无弊”、“最富矿藏”，只是需要用“新式机器”，也就是用现代科学智慧，去发掘、淘炼而已。有的朋友曾表示对大力提倡西学将会造成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丧失的担心，对此，严复明确地回答，引进西学不但不会造成中国传统文化的式微，相反，将大大有利于中国文化去伪存真、去粗存精，使其中的优秀成分发扬光大。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最缺乏的，是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所以，“中国此后教育，在在宜着意科学，使学者之心虑沉潜，浸渍于因果实证之间，庶他日学成，有疗病起弱之实力，能破旧学之拘挛，而其于图新也审，则真中国之幸福

也”。严复对中国传统文化缺乏创新精神的批判，以及对如何促进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见解，可谓入木三分。

综观严复思想，一个很显著的特点就是，他非常强调中国发展进步的过程中“人”的因素，人的自由应该解放，人的权利应该保障，人的观念应该转变，人的素质（德、智、体）应该提高，人民应该成为国家的真正主人。如果说，从洋务运动开始，中国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实行变法维新，直到后来的辛亥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贯穿的是一条从器物到制度的社会客体现代化主线的话，那么，由严复开其端的启蒙运动，就是一条推动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现代化的主线。事实证明，主体现代化和客体现代化是现代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甚至可以说，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的现代化，是一种更加根本的现代化。西方近现代社会突飞猛进的发展，正是以人文主义为核心的文艺复兴和17、18世纪启蒙运动，确立了人的尊严和人的价值，使人的潜在能力得到充分释放的结果。

由于中华民族危机的空前深重和民生的极度困苦，严复所提出的渐进式的改良主张，没有来得及被人们普遍理解并成为社会主流意识，便被疾风骤雨般的革命声浪所淹没。严复作为一位坚持己见的深邃的思想家，也逐渐被许多人视为过时的人物。但是，历史的发展，最终是避不开严复所提出的深刻命题的。正如严复所自许的那样，“有王者兴必来取法，虽圣人起不易吾言”，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终究要补上人的自身完善、人的全面发展这一课。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中国是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直接进入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在现代化过程中，仍然遗留着许多忽视人的权益、人的尊严、人的价值的封建意识残余；我国人民的综合素质与先进国家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人们的法制意识、平等观念、文明习惯和创新能力，都有待提高。这就要求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正视人的因素。严复“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的思想和“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主张，在现实中都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必将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开辟出一个新的境界。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从现代化的角度来看，科学发展观包括了社会主体现代化和客体现代化的所有内涵。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我们要以更加开阔的眼界，来重新审视近代以来所有仁人志士的思想成果，尤其对启蒙思想家严复的历史地位，应该在深入细致研究的基础上，予以充分的肯定；对于他重视人的素质，尊重人的权利，提倡人的自由的思想主张，应该予以大胆的借鉴和吸收，为科教兴国战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正是基于这样的主导思想，多年来福建省严复学术研究会一直致力于推动严复研究和宣传。我们很高兴地看到，在海内外专家学者的努力下，近年来严复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研究领域不断深入，研究队伍不断扩大，对严复思想持肯定态度的学术见解也越来越多。这也说明严复的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正在获得越来越多的共鸣和知音。然而我们也感觉到，严复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及其对中国社会的进步意义，并没有完全为人们所认识，有待于开拓的研究领域还很多，严复研究原始资料的积累还不够充分；作为启蒙思想家的严复的历史作用，也还没有为社会公众所广泛理解，严复的社会知名度还不够高。这些，都是与严复思想的深远影响和巨大历史贡献不相称的。我们愿意与海内外专家学者和有志之士一道，继续把严复研究事业不断推向深入。

（本文作者系福建省严复学术研究会会长）

目 录

严复的爱国主义思想特色及其当代启示	梁 柱(1)
相助于文明	
——严复视野中的民族主义与现代化	邓文初(11)
严复关于近代国家理念的阐释	史革新(23)
严复关于民族问题的论述	苏中立 涂光久(33)
※※※	※※※
严复“三民”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马克锋(45)
传播西方文化 改造国民素质	
——试论严复介绍西学对中国近代思想发展的重要影响	傅小凡(57)
严复与中国传统道德的现代转向	李承贵(68)
从民族救亡到道德重建	
——对严复“救亡”思想的现代思考	王四达(78)
改善民质与人的现代化	
——评严复的国民性改造思想	谢宏忠(85)
严复政治伦理思想刍议	廖志诚(90)
※※※	※※※
严复的中西文化“会通”与自由	区建英(96)
调适与会通:严复的社会和谐思想	李喜所(113)
严复自由主义启蒙思想评析	庞 虎(123)
严复自由观的法理解读	郭道晖(134)
严复的民权观与自由观	俞荣根(149)
※※※	※※※
从“国贵自主”到“自主创新”	
——严复“国贵自主”思想的现实意义	周 济(158)
严复与《居仁日览》	黄克武(166)
严复的法制近代化思想刍议	
——以《法意》按语为核心	黄顺力 段颖惠(177)

严译名著与中国文化的现代化

- 以严复译《群学肄言》为例的考察……………王宪明(185)
- 严复《原富》的时代意义……………陈 锋(202)
- 严复“斟酌新旧间”思想之浅议
- 《与莫理循书》读后……………林 怡(210)

※※※

※※※

※※※

严复思想中的日本因素

- 以清末“东学”为中心……………陈友良 王 氏(217)
- 严复“中体西用”之说与中国近代化进程……………徐心希(228)
- 严复与孙中山思想在促进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差异与互补……………许维勤(239)
- 清末民初知识分子对中西文化的弃守与迎拒:以严复为中心……………李卫华(248)

※※※

※※※

※※※

政术·心术·学术

- 梁启超、严复评王荆公比较研究……………蔡乐苏(259)
- 文缘·学缘·政缘

- 简论严复与吴汝纶“文友”关系中的经世致用“基因”……………董丛林(286)
- 严复与梁启超的经济见解:知识来源与影响力的对比……………赖建诚(292)

※※※

※※※

※※※

- 严复妇女观初探……………邵 雍(301)
- 严复科学教育思想体系之构成……………黄新宪(312)
- 严复的学术思想……………郑剑顺(319)
- 严复辞北京大学校长原因之一解……………林齐模(327)
- 严复与福州船政文化……………苏振芳 肖来富(338)
- 严复视野中的法理与律制……………王 民 陈友良(346)
- 严复宪政法治思想初探……………杜力夫 吴向红(364)

※※※

※※※

※※※

说不尽的严几道

- 由海外严复研究热引起的几点思考……………连燕春(372)
- 五年来严复研究概况(2003~2007年)……………苏中立(379)
- “严复思想与中国现代化”学术研讨会论文综述……………卢美松(387)

后记…………… (392)

严复的爱国主义思想特色及其当代启示

梁 柱

严复是近代中国卓越的启蒙思想家。贯穿他一生事业的，是炽热的爱国主义的感情和思想。爱国主义是他进行民主主义的思想启蒙、救亡图存的出发点和归宿，是他事业的支撑点和基础。毛泽东在总结近代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历程时，他写道：“自从 1840 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一派人物。”^①在这里，他把严复这位思想家，同近代中国叱咤风云的三位政治人物相提并论，可见在毛泽东的评价中严复所具有的独特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同时也表明，作为思想家的严复，在近代中国历史进步的行程中，他是以思想启蒙、促进民族觉醒为特点的，这是严复爱国主义思想的一大特色。诚然，严复的爱国主义思想具有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烙印，但是，爱国主义作为近代中国争取民族独立、实现国家富强的旗帜，在不同的历史时代是有着共通点的，会给后人以历史的启示，具有当代的价值。

一

严复生于民族忧患之时，其家乡为鸦片战争后的五口通商口岸之一，同时又是“西学东渐”领风气之先的一个地方。这使少年严复对国运衰微、俯首外人有切肤之痛，又感受到世界的新潮流。爱国励志、刻苦攻读，成为他少年时代的一个写照。1866 年，由船政大臣沈葆楨创办的马尾造船厂附设的船政学堂招生，严复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被录取，这样，他就以学习近代海事技能、献身海防事业为职志，而不是走旧时士大夫科举仕途的老路。船政学堂的五年学习，使他接触到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1871 年以列最优等的成绩毕业。随后又有五年实习和工作于军舰的航海生活，历经日本和东南亚等地，这不但丰富了他的人生阅历，开阔了眼界，而且也有助于他对国运的思考更加深沉和成熟。

这时的中国同外部世界有了较多的交往。近代中国第一个留美学生容闳学成回国后,就决心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文明富强之境,借此实现使“老大帝国一变而为少年新中国”的宏愿。^②他游说权贵,吁请清廷派遣留学生,但直到六年之后,由于有了洋务运动兴起的机缘,才说动曾国藩、李鸿章等人,于是1872年有了第一批公派赴美留学生。次年,清政府又派遣第二批赴欧洲的留学生,并决定这批留学生全由福州造船厂选送。这时沈葆楨为培养高端技术人才,主张从已毕业的学生中选送国外深造,这就为严复提供了赴英留学的机会。因为经费困难,直到1877年春严复和他的同学才得以成行。

1877年5月,严复到英国不久即进入皇家海军学院学习。按照船政大臣沈葆楨的规定,学习期限为三年,但到1879年8月严复即奉调提前回国服务。在这短短的两年多的时间里,严复有机会直接了解这个典型而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通过专业学习、大量阅读和实地考察,把感性认识和理性思考相结合,为他尔后的思想启蒙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可以说,留学英伦两年多,是造就严复一生事业及其成就的重要转折。

近代先进的中国人学习西方,先是在器物的层面,即在西方的“船坚炮利”的启示下,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进而在制度的层面,即主张学习和效仿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来取代已经腐朽没落的封建专制制度;再而是学习西方的政治思想理论(即时人所谓“西方文明之学术”),用来引领中国社会的改造。应当说,这种学习是热烈而虔诚的。这种学习西方的历程,在严复的留学生涯中,在它向西方寻找救国的真理中,也表现得十分明显。

严复在英国皇家海军学院主要学习海军基础理论及相关技能,对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表现出很大的热情和兴趣。这时他对国家的海军建设和海防事业怀有一种民族的责任感,对专业的学习是专注用功的。但是,强烈的爱国思想使他更加关注民族的命运,面对繁荣富强的大英帝国,思考自己国家的出路。他对仍然固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仅仅从器物层面学习西方,企求富国强兵的洋务派,表示了怀疑。为了更好地了解西方社会、大量阅读西方名著和更多地与英人交往,严复在英留学期间十分重视学习英语,日渐精进,使其水平“胜于译员”(时任驻英公使郭嵩焘对他的评语)。这不但为他深入了解和学习西方提供了便利条件,而且也为他日后归国从事西方著作的翻译和介绍打下了良好基础。

严复用心考察和了解英国社会,并善于把中英两国完全不同的社会状况进行比较,这使他更多地从制度层面思考问题。比如,他通过对英国市政管理的观察,膺服其治理有序,认为“莫不极治缮葺完,一言以蔽之,无往非精神之所贯注”。他反观中国治理失体,造成公理不伸,上下乖离,认为这是因为“谋国者

以钳制其民之私便，必使之无所得为于其间，乃转授全权与莫知谁何，视此如传舍之人，使主其地”。这就触及封建专制制度的根本弊端。进而，他通过对西方社会议会制及政治管理体制的观察，对比了中英两国不同的社会制度下人民所处的迥然相反的社会地位。严复还无法了解资产阶级民主的实质，但他通过现象的观察，认为中国人是作为“苦力”而生存，而西洋人则是“爱国者”，认为“夫率苦力以与爱国者战，断断无胜理也”。^③再如，他通过对英国司法析狱的考察，盛赞其有“辩护之律师，有公听之助理，抵瑕蹈隙，曲证旁搜，盖数听之余，其狱之情，靡不得者”。^④他把这种完善的制度看做国家强盛的重要原因，等等。

严复对西方的了解和认识，还不止于此。他通过对英国社会现实的考察，又广泛接触了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特别是接触了大量的西方政治学术思想，如亚当·斯密、孟德斯鸠、卢梭、边沁、穆勒、赫胥黎、斯宾塞等人的学说，有了比较扎实的西学基础。同前人和同时代人相比，严复对西方的了解和认识有了很大的超越。首先，充分认识中西方之间在社会进化中的巨大差距，今日中国已是“无一事及西洋者”，痛切指出“夫士生近日，不睹西洋富强之效者，无目者也”。应当说，这种认识，是当时学习西方的重要前提，也体现了这种学习的目的性。其次，既看到西洋器物文明的先进性，又看到制度文明的先进性，冲破了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旧格局。再者，在学习西方器物文明和制度文明的同时，更强调要学习西方的文化思想和政治经济学说，他认为，西方的思想理论，不但是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驱动力，而且也造就了适应这种发展的高素质的人。这些认识，确是把近代中国对西方的了解深化了，把学习西方推向了更深的层面。

严复在英国留学期间，以他的勤奋、睿智和独到见解，获得清廷驻英首任公使、洋务派郭嵩焘的赏识和器重，尝以“国士”目之。他曾对友人说“出使兹邦，惟严君能胜其任”。^⑤由于主客观的种种原因，严复并没有走上这种仕途，而是运用这时所获得的知识和感受，以他的爱国热忱从事思想启蒙活动。这既是历史的呼唤，也是历史造就了这位思想家。

严复期望像古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一样，窃得火种，改变和造福苦难的中华。

二

19、20 世纪之交，在中国传播资产阶级政治学说，进行民主主义的思想启蒙，是严复爱国主义思想的重要表现和一大特色。

严复在科举功名和仕途上不是一个得意者，而他所学的专长也未得到发挥。如果用世俗的眼光，以功名利禄为标准来判断人生的价值，是无法理解严复的历史地位的。对严复独特的历史作用，现代史家吴相湘曾作过这样的评述：“历来论者以严留英回国后未展所长，不知最初之因材施教计划，严实用得其所。译述西洋名著，对国家之贡献，更出意想之外。而同时留学归来的刘步蟾、林泰曾、方伯谦等，于甲午战争时身败名裂。萨镇冰较幸运且长寿，民国时任海军总司令，然其成就贡献比较严复实不可同日而语。”^⑥这里把严复同与他同时留学的同学作比较，未必合适，但对严复的历史作用的评价是中肯的。在近代中国历史的发展中，严复的思想启蒙是不可或缺的一页。它的独特的历史作用和历史地位，是别人无可替代的。

严复的思想启蒙活动是同他救亡图存、强国富民的爱国主义的抱负紧密相联的。严复回国后历经长达 20 年的相对平淡和冷遇，在戊戌维新时期始走上历史舞台。他以炽热的爱国激情，把救亡与启蒙、爱国主义与民主主义思想紧密地结合起来。当 1898 年戊戌维新运动兴起之时，中国在半殖民地的道路上已经艰难地行进了半个多世纪，但是许多人对国家已濒临亡国灭种的深渊仍茫然无知，在经受一场外国侵略战争的痛苦之后，仍然习惯于回味昔日的升平日子，幻想着所谓的“同治中兴”。不改变这种麻木状态，救亡和自强都是无从谈起的。而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的惨败，使洋务派 30 年苦心经营的“自强”、“求富”的事业毁于一旦。这次战败，是一个泱泱大国败给了一个蕞尔小国，还被迫订立了空前的亡国条约。它带给中国心灵上的创痛，对沉睡的国人的惊醒作用，是前所未有的。正如严复给吴汝纶的信中所说：“尝中夜起而大哭，嗟呼，谁其知之！”他认为：“大抵东方变局不出数年之中。”他由此受到强烈刺激，如他给陈宝琛的信中所写的“心惊手颤，书不成字”，忧患“时局愈益坠坏”，国家已是“如居火屋，如坐漏舟”，愤谴“当路诸公束手无策，坐待强寇所欲为”。他期待有“撑挂光复”之士，挽救危局。应当说，甲午战败及其后接踵而至的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狂潮，使先进的中国人开始了新的思考和新的探索。

如前所述，严复回国后，以他的才学而论，可说是一个怀才不遇、失意宦海的书生。他曾寄予厚望的洋务运动的破产，科举考场的失意，虽曾使他一度彷徨，但难灭其强国富民之志。他受到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的强烈震撼，投身到变法维新运动中去，著书立说，要求变革救亡，从而开始了他人生的真正转折。他在后来给梁启超的信中回忆了当时的心态：“甲午春半，正当东事皋兀之际，觉一时胸中有物，格格欲吐，于是有《原强》、《救亡决论》诸作，登布《直报》。”^⑦抒发了他奋起救亡的爱国情怀。

从1895年起,严复在天津《直报》上发表一系列政论文章,抨击中国两千多年来的专制政治和思想罗网,在社会上产生巨大的影响。他在文章中公开表示:时局一至如此,我宁愿背负发狂之名,也不能吞吞吐吐,甚至无耻作伪。“今日请明目张胆为诸公一言道破可乎?四千年文物,九万里中原,所以至于斯极者,其教化学术非也。不徒嬴政、李斯千秋祸首,若充类至义言之,则六经五子亦皆责有难辞。”^⑧在这里,他对造成深重的民族和社会危机的原因作了深层次的思考,认定是“其教化学术非也”。很显然,他是从中西文化思想比较的角度,认为中国固有的以六经五子为代表的思想体系已不合时代的需要,是造成国民文化思想和心理素质落伍的根源。正是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他提出了“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改造国家的根本主张。

严复的“三民”主张,特别是“开民智”,反映了他思想启蒙的主要含义和目的。在严复看来,鸦片战争以来的“师夷长技”主张之所以未获成功,根本原因在于历史造成的国民素质的低下,以至“准橘为枳”。他在留英期间,通过实地考察,就深感西方国家的强盛是同拥有高素质的国民紧密相关的。他说:“中国知西法之当师,不自甲午东事败衄之后始也。海禁大开以还,所兴发者亦不少矣:译署,一也;同文馆,二也;船政,三也;出洋肄业局,四也;轮船招商,五也。……此中大半,皆西洋以富以强之基,而自吾人行之,则准橘为枳,若存若亡。”究其原因,“是故苟民力已荼,民智已卑,民德已薄,虽有富强之政,莫之能行”。^⑨他认为,救亡图存、强国富民的治本之术,在于开发民力、民智、民德。他所谓的“鼓民力”,即指要增强国民的体魄。为此,首要的是要废弃那些摧残国民精神和健康的封建礼教、陈规陋俗。“故中国礼俗,其贻害民心而坐令其种日偷者,由法制学问之大,以至于饮食居处之微,几乎指不胜指。而沿习至深、害效最著者,莫若吸食鸦片、女子缠足二事,此中国朝野诸公所谓至难变者也。”^⑩他把这看做是言治的当务之急。所谓“开民智”,他明确说:“欲开民智,非讲西学不可。欲讲实学,非另立选举之法,别开用人之途,非废八股、试帖、策论诸制科不可。”^⑪他历数八股取士制所产生的“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的严重危害,力主废除,实行注重科学的新式教育。至于“新民德”,严复认为要用西方的自由平等、天赋人权的思想,来打破封建纲常思想和等级制度对人们思想行为的束缚。

严复在维新变法运动中举起思想启蒙的旗帜,大力传播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思想,攻击封建专制及其思想体系,赋予救亡运动以明确的民主主义的思想内涵,这在当时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他以对民族的高度责任感,把讲西学以启民智作为自己的一项历史使命,以主要精力从事西方学术论著的译介工

作。他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穆勒的《名学》、甄克思的《社会通论》、亚当·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鸠的《法意》和赫伯特·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等,宣传唯物主义的实验论,宣传资产阶级的古典经济学的原理,宣传“三权分立”的资产阶级政治学说。他把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涉及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和逻辑学诸领域的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相当全面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来了。在民族危机深重,国人精神萎靡、思想枷锁重重的情况下,严复以天演一说惊醒国人,反对“任天而治”,坐以待毙的麻木思想,强调人类能够通过自身的力量来改变环境,“天不可独任,要贵以人持天”。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严复十分强调群体的作用,他认为“人之所以为人者,以其能群也”,这是人“贵于禽兽”的表现。应当说,维新变法的倡导者对群体的作用是有一定的认识的。康有为强调要“以群为体,以变为用,斯二义立,虽治千万年之天下可矣”。梁启超也盛赞泰西“群术之善”。而严复则更强调“能群善群”的重要性。他在《天演论》的按语中写道:“天演之事,将使能群者存,不群者灭;善群者存,不善群者灭。”从这里可以看到,严复之所以把“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作为标本兼治的苦心所在。应当看到,中国是一个长期以分散的个体小生产占支配地位的封建社会,这种生产方式带来了形同“一盘散沙”的社会心理状态,这种缺乏群体竞争力的状态也造成了我们民族在列强面前的劣势地位。在我们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启蒙思想家致力于开启民智,激励民族凝聚力,鼓吹“与天争胜”、“人定胜天”的精神,是有重要意义的。

严复在传播西方思想中,以历史的眼光对比了中学和西学之间的本质区别,抨击了一切顽固守旧的论调,他说:“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众讥评。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虞。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务发舒;中国尚节文,而西人乐简易。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其于祸灾也,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人力。”^⑧严复以这样尖锐的方式,强烈对比了中西文化之差异,他虽表示“未敢遽分其优劣”,但实际上是否定前者,肯定后者,这确是发前人所未发,切中时弊,振聋发聩。在他看来,中国社会政治危机的深刻根源在于文化思想,是数千年积淀下来的传统文化的弱点造成的,而近世面临的民族和社会危机证明这种文化传统已不适合新的时代要求,已成为现代中国人生存和发展的羁绊。他呼吁要认清时势,“知运会之所由趋,而逆睹其流极”,就是说要善于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当机立断,改弦易辙,方能挽狂澜于既倒。他的结论是:“不容不以西学为要图。此理不明,

丧心而已。救亡之道在此，自强之谋亦在此。”^③

严复的思想启蒙工作，使“西学东渐”进入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使西学在中国的传播有了系统而明晰的理论内涵，大大拓宽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世界眼光，这不能不对中国思想界和近代革新运动产生巨大影响。1905年严复和孙中山有过一次讨论，严说：“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之于丁。为今之计，唯急从教育上着手，庶几逐渐更新乎。”孙答：“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仍实行家也。”在这里，孙对思想家的作用是肯定的，同又对渐进的主张表达了委婉的批评。这表明他们两人之间的区别。但必须肯定，严复的思想启蒙，又确实为孙中山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做了重要的思想发动和思想准备。

三

严复的思想启蒙反映了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要求，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个历程，是有着重要的历史功绩和历史意义的。特别是贯穿他一生事业的爱国主义思想，更是值得后人学习、继承和发扬的。

中华民族在她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能够做到历经磨难而不衰，在世界四大文明发源地中，也只有中华文明传承至今，应当说这是同我们民族具有深厚的爱国主义传统相关联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像在《周易》这部元典中，《易传》就把《易经》概括为“其辞危”，就是说有危机感，有忧患意识。这时的忧患意识还主要表现为忧君、忧位，因为“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所以在《易经》的《否卦·爻辞》中有“其亡，其亡，系于苞桑”的说法。到了孔子那里，忧患意识则主要表现为忧“道”，忧虑尧、舜、禹、汤、周的道统中断，所以有“朝闻道，夕死可矣”的说法。儒家学说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孟子，他明确提出“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这就是说，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忧患意识，没有敌国观念，这个国家就会灭亡。正是出于这种忧患意识，他提出了“君轻民贵”的主张。他劝齐宣王要“乐民之乐也，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要“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当然古代的这种民本思想，还不能超出以君主为本位的历史局限，但它毕竟把忧患意识引向了忧国忧民，是深化了。当然，在不同的时代条件、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忧患内容，但其共同的一点，就是表现为：心系国家安危，情牵黎民百姓。这种忧患意识使中华民族有很强的整体认同感，有荣辱与共、患难与共的情怀，有无以为国、何以家为的先国后家、先人后己的高尚风格，有公而忘私、国而忘家的